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 *

李伯重

The two main issue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1) Jiangnan (the Yangzi Delta) saw a very slow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times (1644－1850). The growth rate was strikingly low－only about 0.3 percent a year in such a long period of two centuries, which was not only much lower than those of most parts of China or of china as a whole at the same period, but even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those of Jiangnan itself in the preceding period of the Ming: (2) the slow growth of population was the result of a positive population control in Jiangnan, leading to a "harmony" or equivale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growth and aiming at that the people could keep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that they had enjoyed. In this sense, we can say that this demographic behavior is quite rational or even "modern". These findings challeng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denying that there was anything like "population explosions" or "no controlling population increase" in early and mid－Qing Jiangnan.

在海外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口问题通常占有一种特殊的分量。尽管一些学者在若干问题上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但是在以下一点上，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似乎颇为一致：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沉重人口压力的出现；这种压力与日俱增，在 19 世纪中期达到极点，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到了 1980 年代，这种看法在我国也逐渐流行了起来。在一些论著中，清代前中期（特别是 18 世纪）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口过剩，被说成是阻碍中国未能如西方那样发生重大经济变革并由此而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罪魁祸首[1]。更多的学者虽然未必同意人多为万恶之源的结论，但是似乎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确实增长过快。此种看法又基于以下共识：1.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习俗鼓励增加人口；2. 除了天灾人祸之外，近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3. 中国人民（至少是其主体—— 农民）一向过着一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因此，如果没有天灾人祸，人口就必然会"自然而然地"增长。既然清代前中期（特别是 18 世纪）中国的经济状况还能够使人民维持起码的生活，因此人口必然迅速增长，而且越是在富裕的地区，人口增加也越快[2]。总之，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无需再讨论的定论。

然而，仔细推敲上述看法，有不少地方颇成问题。首先，与同时代的西北欧国家或者清代以前的中国相比，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到底是否过快？近年来一些学者已提出否定的看法[3]。其次，清代的人口增长是否已经导致严重人口压力的出现？这种压力是否已经阻

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觉得似乎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4]。再次，从近代中国的情况来看，经济落后的地区（如华北）人口增长反而比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华东与华南）更快（参阅千里与大同1994年著作）。这和上述"地方越富裕人口增加越迅速"之说恰好相反。最后，如果近代以前的中国确已出现人口压力，那么这是否也可能发生在清代以前？依照一些学者的看法，人口占明初全国总数之半的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三省，在有明一代，就已经人口过多，存在着"稠密人口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从翰香1984年著作）。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从宋代起中国的人地比例关系就因人口压力而严重恶化（参阅千里与大同1994年著作引贾永吉〈Michel Cartier〉所作的有关评述）。还有学者更推测甚至早在秦汉时的关中，这种人口压力就已出现（黄宗智〈Philip Huang〉1990年著作第326－329页）。如果在清代以前很久中国就已人口过多、出现了人口压力，那么清代前中期的"人口爆炸"或"人口奇迹"又怎么能够发生？这些相异乃至相反的意见表明：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是否增长过快以致引起严重人口压力之说，尚远非定论。

我们认为：要弄清清代前中期人口是否增长过快，关键是如何认识近代以前中国的人口行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下不一，文化习俗也千差万别。设想近代以前的中国各地在人口行为上会相互一致，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清代前中期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增长速度有差异。这里，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人口增长较慢地方的人民，究竟通过什么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他们控制人口增长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经济因素对于这些地区的人口行为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地区的人口行为与经济状况之间具有何种关系？这些问题，都尚待我们深入探讨。

清代前中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上最富裕、同时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按照开始提到的那种流行看法，如果说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出现严重人口压力的话，那么应以江南最为可能。因此之故，本文选择此地区作为探讨的对象。下面将要探讨的具体内容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增长情况和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控制的主要动机。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控制手段和与人口问题所涉及的两个问题——如何看待"最低生存水准"和如何定义"人口压力"，我们将在另文中进行讨论。

一、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过速吗？

要了解清代前中期（1644—1850年）江南人口增长过快，首先必须获得清初和清中的人口数字，然后与以往的人口变化情况作比较。而这又必须获得清代以前江南的人口数字。本文中要作的比较是与明代江南的比较，所以我们所需获得的，也就是明初与明末的人口数字。再次，因为我们也要将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变化情况与同时期全国的情况作比较，所以还需要获得相应的全国人口数字。以上这些数字都齐备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江南和全国在各有关时期的人口年成长率并且进行比较，从而看到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大致增长情况及其特点。

在以上所需要的各个人口数字中，全国数字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明初江南和清中江南的数字，也不难求诸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困难的是明末江南和清初江南的数字。由于这两个时期的官方数字完全脱离实际，不可能据之得到接近真实的数字，因此本节的重点，就是设法对这两个时期江南的人口数量作出一个比较近于实际的估计。下面，我们先讨论明初和清中期江南的人口数量。

（一）尽管也存在种种问题，但一般而言，明洪武 26 年（1393 年）和清道光 30 年（1850 年）的全国各地人口统计数字（特别是前一数字），相对来说最为可靠，比较接近真实情况[5]。根据《万历会典》卷 19 中的各府数字，我们可以得知苏、松、常、镇、应天五府 1393 年的人口，合计约 606 万。明代文献中未见有杭、嘉、湖三府 1393 年的人口数字。但康熙《浙江通志》卷 15 所载这三府"明初"的数字（合计约 264 万），比洪武 24 年（1391 年）数字略高，我们认为应当就是 1393 年数字。因此，江南八府合计，1393 年人口大约 870 万。清中期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王业键对 1850 年苏、松、常、镇、宁（应天）五府人口数量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见王业键〈Yeh－chien Wang〉1965 年著作）来求得，即以 1850 年户部清册中江、浙两省的人口总数为基础，根据嘉庆 25 年（1820 年）江、浙两省人口分布，求出 1850 年江南各府的人口数字，然后相加得出总数。按以上方法求得的结果是：1850 年江南的人口总数大约为 3,635 万[6]。因此大概而言，1400 年和 1850 年的江南人口，分别在 900 万和 3,600 万左右。

（二）明代中国人口变化有两大特点：第一，从洪武元年（1368 年）至万历 28 年（1600 年）前后，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何炳棣 1989 年著作第 23 页）；第二，东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全国人口增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全国而言，随着严重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和加剧，明初以来人口的直线上升到 1600 年前后基本结束，所以何炳棣、柏金斯等学者都把 1600 年作为明代中国人口的顶峰时期。但就江南而言，由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严重自然灾害更一直到 1630 年代末期才发生，这种直线上升似乎一直继续到崇祯初年（1630 年前后）才告终止。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把 1630 年前后作为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时期。

明代中国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部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按清代的行政区划）。在 1393 年的全国人口中，这四省的人口占了 51%[7]。明代跨省移民已有相当规模，但远逊于清代，尚不足以对全国人口分布的改变造成重大影响。从谢肇淛的《五杂俎》所描绘的全国各地情况来看，直至 17 世纪初期，人口稠密的地区仍然只限于长江下游、浙西、皖南的徽州和福建省。整个西南、广东、湖南和湖北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都还有大量未开发的可耕地（何炳棣 1989 年著作第 261、262 页）。换言之，在整个明代，全国人口分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明代的全国人口成长率的形成，主要应取决于东南部人口集中的四省的人口成长率。

在上述四省以外的地区，华北五省（1393 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 26%）人口成长率约为 3.4‰，可能低于南方地区的成长率（何炳棣 1989 年著作第 10、261、262 页）。而在南方各省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的人口成长率可能又低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等省（除贵州外，以上地区 1393 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 20%。见何炳棣 1989 年著作第 10 页）。这不仅是因为江苏等四省为人口净输出地区而湖南等六省（四川情况不详）为人口净输入地区，而且因为湖南等省正处于农业开发之中，耕地增加迅速[8]，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应更快。所以这些省份的人口成长率肯定比江苏等省更高。华北五省与湖南等七省合计，高低相互抵消后的成长率很可能也近于全国平均数。因此，全国平均数应当比较接近江苏等东南部四省的成长率。

在东南部四省中，江南又占有特别的地位。1393 年江南人口占这四省人口总数的 27%（或江苏、浙江两省人口总数的 46%，全国总数的 14%）。因此大体而言，江南人口成长率应当也很接近于全国的成长率。用柏金斯的人口数字计算（柏金斯〈Perkins〉1969 年著作第 216 页表 A.7），1393－1600 年间全国的年人口成长率大约为 3.8‰。1400 年江南人口接近 900 万，如果采

用3.8‰的年成长率来计算的话，1630年人口大约为2000万。但是若以1393年与1850年两个数字(870万和3640万)为基础来计算，那么所得到的年成长率为3.1‰；而由这个成长率求出的1630年人口约为1,870万。这个数字与用前面方法得出的数字相差约130万。比较上述两种方法，前一种方法无疑更有道理，故所求得的结果(即2,000万)，应当更合理一些。此外，明代后期江浙人士一再谈到当时江南“人稠地狭”[9]。由此来看，采用高一些的数字，应当更为符合事实。

(三)清代前中期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7世纪前半期巨大的人口损失所造成的人口基数过低(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1600—1650年间全国的人口年成长率约为—4.9‰)。这一损失，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因此何炳棣认为1700年的人口是否已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尚难以确定(何炳棣1989年著作第264页)。江南在1630—1664年间也有颇大的人口损失；而江南的社会经济状况，至早也要到1680年代才大致恢复正常(全面的恢复可能还要更迟一些)[10]。但是，由于江南人口损失和经济破坏的程度远比全国大多数地区小，恢复的速度应当会快一些。这里我们假设江南人口在1680年已恢复到以前的最高水平——1630年的2000万[11]。这样的话，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年成长率就大约为3‰，比其1393—1630年间的年成长率大约低1/5。

(四)按照柏金斯的全国人口数字计算(柏金斯1969年著作第216页表A.7)，1650—1850年间全国的人口年成长率大约为6‰，增加速度确实比明代(3.8‰)快得多。但是除此之外，清代人口变化与明代还有一个重大差异，即清代全国人口的增长，更多地取决于明代人口高度集中的东南部四省(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以外的地区。从一些官方人口数字来看，清代前中期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成长率，明显低于全国成长率。例如，就人口数字相对较为可靠的18世纪中期以后而言，1761—1850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117%，但江苏和浙江却只分别增加了91%和95%。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之一，东南部四省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江、浙两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761年以后的90年内就下降了2.2个百分点，即从1761年的19.5%降到1850年的17.3%(有关数字采自全汉升与王业键1961年著作附表)。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1400年前后，这两省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高达29.8%(参阅吴金成1990年著作第113页)。

在清代前中期，人口稠密的江、浙两省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而在这两省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江南，人口增长速度又低于两省的平均增长速度。例如，1789—1838年间全国人口增加39%，但江苏仅增加了32%，浙江也只增加了31%；两省的成长幅度都只在全国成长幅度的80%左右(这个比例与1751—1850年间的相应比例相同)。在此期间(1789—1838年)，位于江南中心地带的嘉兴府的人口，更只增加了21%，其成长幅度约为同期江苏与浙江成长幅度的2/3，或全国成长幅度的1/2[12]。由此来看，1680—1850年间江南的人口成长率(3‰)约为1700—1850年间全国成长率(6‰)的一半，应当是可能的。

(五)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明代后期江南，而且也低于清代前中期中国其他地区。这在刘翠溶对于明清长江中下游若干家族人口变化的研究中，也已得到证实。她所研究的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11个家族[13]，1700年以前的人口成长率并不比1700—1800年间的人口成长率低；相反，从刘氏所绘的上述家族人口增长曲线来看，只有武进周氏1600—1700年间的人口成长率低于1700—1800年间的成长率，其余的如萧山郎氏及李氏、慈溪钱氏、青溪严氏等，1600—1700年间的人口成长率都略高于1700—1800年间的成长率。这些家

族以及未有 1700 年以前数字的武进邹氏、余姚史氏、萧山徐氏、沈氏和曹氏等家族，1700－1850 年间的人口成长率都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换言之，从这些家族的情况可见，清代前中期江南及其毗邻地区的人口成长率，自明代后期以来，是在逐渐下降的。刘翠溶对于明清长江中下游 5 省 15 个家族的人口变化的研究还表明：在这 5 省中，江苏的生育率最低；在江苏省内，长江以南（武进周氏、邹氏）的生育率又低于长江以北（江都朱氏）。江苏而外，生育率由低而高的顺序是浙江（萧山与余姚）、安徽、湖北、湖南。这个结果和刘氏其他关于明清长江下游地区人口研究所得的结论——长江下游的核心区（大致相当于本书中的江南）的生育率，略低于长江下游的边陲区（苏北、浙南、安徽等地）的生育率——相互吻合（刘翠溶 1981、1983、1987 年著作）。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的成长率和大大低于清代前中期的全国平均成长率的结论，与明清江南和全国人口变化的背景是一致的。何炳棣、全汉升和王业键把导致清代前中期（主要是 18 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纳为：1. 长期的和平与较好的统治；2.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作物良种（如早熟高产稻种和美洲农作物）的推广与引进；3. 工商业的发展（何炳棣 1989 著作第 8、9 章，全汉升和王业键 1961 年著作）。这里，我们即按照此观点，来检查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合乎事实。可以看到：在以上三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在明代与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都存在（尽管孰优孰劣还需要认真分析）；而在清代前中期，这个原因在江南的重要性可能不如在同时期中国其他许多地区那么明显[4]。第二个原因在明代江南还起着一定作用[5]，而在清代则几乎完全未起作用；而在清代前中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原因所起的作用极其重大。第三个原因在明代和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都很重要，而且在清代前中期江南所起的作用无疑比明代江南或者清代前中期中国其他地区更大。然而，尽管如此，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工商业发展对人口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简言之，上述能够导致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它们在江南所能起的作用，不仅比在同时期的全国大多数地区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而且也比其在明代江南所能起的作用要小。因此，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成长率自然应当比较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找出究竟有什么原因，使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人口，能够像明代江南或者清代前中期中国大多数地区那样较快地增加。

二、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为什么呈现低速增长？

然而，要使人口低速成长，清代江南人民还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在拙文《节制生育，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之二》（李伯重将刊稿）中，我们对这些措施已作了专门的探讨。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他们进行人口控制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增长？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个人（或家庭）选择采用某种措施的直接动机，往往有很大差异。不仅如此，甚至采取同一种措施，不同的人也常常出于完全不同的主观原因。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采用这些措施时，并未自觉地起降低人口成长率的作用。例如溺杀女婴，有的是因为家庭贫穷，无力养活；有的是出于迷信；有的是害怕女儿长大出嫁时要为她办丰厚的嫁妆；等等（利玛窦与金尼阁 1683 年著作第 92 页，何炳棣 1989 年著作第 59 页）。独身的动机则更为复杂，有的固然是因为家贫无力嫁娶（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但有的却是由于社会舆论的鼓励与

强制(如守节),或者是出于宗教原因(如出家)、反抗包办婚姻(抗婚),等等。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在采用以上措施中某一种或某几种、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时,各个个人(或家庭)的具体动机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经济的因素仍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进行人口控制的最重要、最深层的原因。而这种经济原因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这里,我们通过清代前中期江南学者的言论,来看一看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主流是鼓励增加人口。一直到了17世纪初期,才开始有少数学者提出应当控制人口增长。以后关于人口控制的思想逐渐发展,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成为重要的人口思想流派。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持有这种见解的重要学者,都是江南人士。虽然他们谈的是全国性的人口问题,但是不能否认:他们关于人口控制的见解与他们的出身环境,彼此之间肯定有一定关系。否则,为什么这种思想主要流行于江南学者之中,而不是其他地区(例如华北、华中或者西南)的学者之中呢?因此我们认为:江南学者对于人口问题的新见解,应当说是当时江南大多数人民普遍认识的集中表现。

最早感到明代中国人口增长太快的学者,可能是董其昌(松江府华亭县人,1555—1636年)。在1614年的一道奏疏中,他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已是明代初年的5倍(引自何炳棣1989年著作第260页)。稍后,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1562—1633年)首次提出人口大约每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观点。虽然他并未说这样的成长率已经或者将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但是他同时也谈到东南沿海人口过多,耕地不够,因此主张大量移民到华北、两广。徐氏的同时代人冯梦龙(苏州府长洲县人,1574—1646年)进了一步,提出一对夫妇"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太平广记钞》"古元之"条)。他已感到:从长远而言,如果每个家庭养育4个子女,那么生活资料的增长是无法跟上的;只有将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控制在2人,才是长久之计。到了18世纪前期,任启运(常州府宜兴县人,1670—1744年)则指出:"身生子,子又生孙,齿日繁,粮日困,亦必然之势也"(《清芬楼遗稿》卷1),即粮食生产的增加无法赶上人口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总的来说,在18世纪中期以前,江南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的看法还很初步。一直到18世纪后期,这些看法才发展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就是有"中国马尔萨斯"之称的洪亮吉(常州府阳湖县人,1746—1809年),其后继者则是更为激进的汪士铎(江宁府江宁县人,1814—1889年)。洪、汪二人都坚信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增加速度[16]。人口增长的结果,洪氏认为只会是:每人平均拥有的田地、房屋等生活和生产资料愈来愈少,因而收入越来越低;物价上涨,工资下降,劳力越来越不值钱;失业增加,社会动荡。汪氏则认为是:人民贫困,人口质量降低,社会动乱不安,国势积弱(参阅张敏如1982年著作第157—158,167—169页)。而在这些结果中,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就是因生活水准下降而导致贫困化。要避免生活水准下降,就必须控制人口增长,乃是必然的结论。这一点,以洪、汪二人的激烈言论为标志,我们可以认为清代前中期江南大多数人是已经认识到了的。

虽然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是否愿意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而采取某种人口控制措施呢? 李中清(James Lee)对于清代皇室人口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清代中国人不仅愿意这样做,而且也已经这样做了。例如,在1700—1840年间,宗室妇女的结婚年龄从十五六岁提高到了二十多岁,独身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同时,宗室男子纳妾率有

惊人的下降.他们每个妻妾的生育率以及每个家庭(单妻或多妻家庭)的生育率.也都在降低。不仅如此,宗室初生婴儿的死亡率也在变化。1775—1800年间宗室女婴出生后一个月内的死亡率竟然高达1/3.比贫穷的辽宁旗人农户还高。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李氏认为是宗室成员从国家得到的津贴减少了(李中清1994年著作)。本节的讨论表明:这一时期的江南人民已经清楚地知道要避免生活水准下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而从拙文《节制生育,控制增长——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问题探讨之二》所作的分析,可知他们确实在使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长。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是无可置疑的。该文还指出清代前中期江南儿童在人口总数中比重很低.也表明了江南人民确实已把人口控制付诸行动。换言之.江南人民使用这些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乃是为了避免因人口剧增而变得贫困。

李中清的研究还给我们一个启发:在控制人口以保持生活水准不致下降方面.经济境况较好的人们(如宗室成员),比起经济境况较差的人们(如辽宁旗人农民)来.前者的愿望更为强烈.所能采用的手段也更为充分[注]。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富裕程度不同的地区的人们之间。前面所引刘翠溶的研究结果,已表明清代江南的生育率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中最低。而众所周知,江南的生活水准在全国各地中最高。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确实比其他地区人民.更加愿意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准不降低。因此.经济原因确实是导致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低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最后.我们还想从更广的意义上谈一谈上述人口史研究所引发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过去的清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近代至上论"的倾向.即认为主要是起源于西方的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等都至高无上;没有它们.就没有发展、没有进步。清代前中期的中国.由于确实没有产生或引进这些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所以必然是社会僵化.经济停滞。近年来海内外史学的发展.已推翻了旧有的"清代社会经济停滞"论。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中.这种"近代至上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中国人口行为的偏见。根据这种偏见.在近代生育观念和近代医药知识出现和普及以前.中国人口行为的特征是放任增长.在人口控制方面无所作为.结果自然是人口剧增或"人口爆炸"。然而.正如本文讨论所示.即使是在近代生育观念和近代医药知识引进以前很久的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民已经在运用种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了一种至少是同步前进的和谐关系.从而避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被过快增长的人口所吞噬。这种非常"近代"的观念和相应的措施.确实保证了江南经济在清代前中期的两个世纪中有可观的发展.并且能够提供必要的积累.成为中国新生产方式的主要摇篮。如果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判别某一事物或现象是否属于"近代"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公认的那些近代思想、观念、组织和技术等被引进之前很久.中国(至少是某些地区)人民的若干所为就已经相当地"近代化"了。在某些方面.反而是后来不如以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在1949年以后.我国(大陆)的人口能够以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年成长率为3‰左右)增加的话.我们今天也不必为人口过剩的问题而苦恼了。因此.若是为"近代至上"的偏见所蒙蔽.否认过去确实存在的事实.把古人都看得愚不可及.那倒是有失公允的。

---

* 本文中的"清代前中期".指自清军占领江南至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即西元1644—1850年。"江南地区"则指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地区.包括清代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八个府。这样界定的理由见李伯重1990年著作。

①贾永吉(Michel Cartier)总结说:关于清代中国人口增长过速以及出现人口危机的观点,首先是何炳棣提出,尔后为柏金斯(Dwight Perkins)、伊懋可(Mark Elvin)等加以证实,并为几乎所有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所接受(参阅千里与大同 1994 年著作对贾氏《北中国与南中国:人口增长的悖论》一文的介绍)。事实上,直到 1990 年代,这种观点在海外依然还很流行。例如黄宗智 1990 年著作的基本观点——他本人提出的"过密型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说——的基础,仍然是人口过剩,以致使得经济"只有增长而无发展"。在 1980 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不少人接受了清代人口爆炸、人口过剩的观点,但大多似乎未作认真思考和专门研究。此种情况可见于 1980 年代初期一些流行文章(如陈平 1981 年著作等)。

②在这方面,秦佩珩的看法颇具典型性。他认为:过去中国的人口变化"完全决定于出生与死亡两种力量的对比"。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医药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因而"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率会自然提高"。在清代初期,江南苏、松、常地区人口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而且"是个鱼米之乡,生活条件优越,人口自然跟着大增"(秦佩珩 1984 年著作第 244—245 页)。黄宗智也认为近代以前中国普遍结婚而且早婚,人口变化主要取决于死亡率的变化(黄宗智 1990 年著作第 329 页)。

③例如葛剑雄 1991 年著作第 10 章第 5 节已批驳了清代人口成长率大大高于以往的说法。王国斌(R. Bin Wong)、威廉. 拉夫里(William Lavely)、李中清(James Lee)等人的研究则证实 1700—1850 年间中国的人口成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王国斌与威廉. 拉夫里 1991 年著作、李中清 1994 年著作)

④至少,一直到 19 世纪前半期,中国最富裕和繁荣的地区,仍然主要是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经济进步的主要成就(例如"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化、农村工业化,等等),大部分也集中在这个地区。因此,与该地区的过去或者与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清代前中期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很难说是增长过快或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此外,贾永吉也已指出:19 世纪中国人口增长的停滞,并不能证明人口压力已达到经济无法支撑的地步(见千里与大同 1994 年著作对贾氏《北中国与南中国:人口增长的悖论》一文的介绍)。

⑤参阅何炳棣 1989 年著作第 3—4 页,柏金斯 1969 年著作第 202—209 页。1850 年人口数字的可靠性可能会低一些(例如施坚雅(G. Wil Liam Skinner)已指出 1850 年许多地区的人口数字可能都偏高。见施坚雅 1987 年著作),但是这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可靠的人口数字之一。

⑥这里我们使用的 1820 年江、浙两省分府人口数字,是经过梁方仲校正的数字,故所得出的 1850 年苏、松、常、镇、宁 5 府人口数,与王业键的数字略有不同。参阅梁方仲 1980 年著作第 273—279 页。

⑦何炳棣 1989 年著作第 10 页。江苏人口系南直隶人口减安徽人口而得,参阅吴金成 1990 年著作第 113 页。

⑧例如据官方统计数字,在 1400—1600 年间,湖南耕地增加了 153%,湖北增加了 310.2%,此外四川也增加了 279.5%。而江苏则仅增加 28.5%,浙江增加 1.3%,江西增加 18.8%。到 1600 年,湖南、湖北、四川的耕地总数合计已超过江苏和浙江的耕地总数合计。见吴金成 1990 年著作第 113 页。

⑨例如万历时人诸葛升说:"江南寸土无闲,……民间莳葱韭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数共争,谁能余隙地?"同时代人徐贞明也说:"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徐光启则说:"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二徐皆江南人,诸葛升则为毗邻江南的浙江寿昌人。以上引文见《农政全书》卷 8 所载诸葛升《垦田十议》、卷 9 徐光启《垦田疏》、卷 12 徐贞明《西北水利议》)。此类说法,还散见于江南地方志。此外,关于明代后期江南城市人口众多的记载,更多见于各种文献。

⑩江南的抗清战斗,到 1664 年以自称为明太子的朱光辅被擒而大致告终,但零星的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 1670 年代中期(见谢国桢 1959 年著作第 127—140、146 页)。天灾人祸造成的土地抛荒,在 1660 年代也还大量存在。例如直到康熙初年,仅宜兴一县的荒田还达 10 万亩(储方庆《荒田议》"饥民垦荒议",载《皇朝经世文编》卷 34)。宜兴并非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情况可想可知。至于城乡工商业,不仅在 1630—1664 年间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 1680 年代以前还受到许多严厉禁令的压制(例如迁海令),所以恢复更为缓慢(例如丝织业,谢国桢认为到 1883 年平定台湾后才恢复。见谢国桢 1982 年著作第 66 页)。

⑪据当时一些人的印象,到 1690 年代,除四川外,各省的人口都已超过 17 世纪中期的数量(何炳棣 1989 年著作第 264 页)。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17 世纪中期的人口肯定少于 17 世纪初期的人口。江南的情况可能会好些,因此我们姑假设江南人口在 1680 年代已恢复到 17 世纪初期的水平。

⑫清代的官方人口数字，在1776年以后相对可靠(参阅何炳棣1989年著作第4章)。借以求得上面的百分比人口数字，见全汉升与王业键1961年著作表4和附录(全国和江苏、浙江)，以及梁方仲1980年著作第450－451页表22(嘉兴)。

⑬见刘翠溶1981年著作。该文所讨论的家族共16个。除了本文中提及的11个外，尚有归安(南浔)周氏、会稽秦氏、鄞县厉氏、桐城王氏与赵氏。桐城在长江以北，情况与长江以南在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故在此略而不论。另外，在该文中，无归安周氏、会稽秦氏和鄞县厉氏1800年以前的人口成长率数字。因此我们仅采用刘翠溶对其余11个家族有关情况的分析。

⑭江南自明朝建立以来，除16世纪中期受到倭寇骚扰外，一直是和平时期。至于明清两代的统治何者较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则一直有争议。例如，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明朝后期的统治较优(甚至认为明代后期的政治腐败，也似乎并未严重阻碍江南经济的高涨)，因此才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清朝的统治(至少是在前期)则阻碍了原来的经济发展势头，从而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而在较近的研究中，相反的意见似乎又占了上风。但是，就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广大开发中和待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清朝的统治无疑比明代好得多。

⑮根据滨岛敦俊的研究，江南的农田的"内涵式开发"(即开垦原有圩围内的荒地和改造低产耕地等)，大致要到17世纪中期才基本结束(滨岛敦俊1989年著作。但从北田英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即使到17世纪中期，这一工作也还未完成。见北田英人1988年著作第41－42页)。因此，尽管万历江南耕地统计数字少于洪武数字，但是实际上在整个明代，江南耕地的数量仍有相当的增加。而在清代即使有增加，增加的数量也很小。

⑯洪氏认为在和平时期，人口每隔一代都会成倍增加，因此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会增加5倍、10倍乃至20倍。但是田地、房屋等只能增加1倍、3倍至5倍。汪氏则认为人口每20－30年增加1倍，自清朝建立210年以来就增加了128倍(即按几何级数递增)；但是耕地扩大和粮食等生活资料的增加却慢得多，而且到19世纪中期资源更已开发殆尽，故"天地之力穷矣"。但是洪、汪二人所说的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只是假设，并没有实际的调查统计数字作为根据(参阅张敏如1982年著作第156－157，166－167页)。

⑰李氏关于辽宁旗人农村人口的研究还表明：甚至在同一家族内，家长家庭中的女婴溺杀率也大大高于其他家庭。家庭在家族中的地位越高，家庭中女孩的比例越低，这已经成为规律(李中清1994年著作)。

征引文献

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收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年。

陈平：《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的模式》，载于《学习与探索》(哈尔滨)1981年第1期。

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载于《中国史研究》(北京)1984年第3期。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91年。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葛剑雄据1959年英文版译出)，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9年。

胡焕庸：《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原载于《地理学报》1934年第1卷第2期，后收于胡氏《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83年。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1990年第4期。

李中清：《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新近的研究成果及意义》，收于李中清与郭松义主编《清朝皇室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4年。

利玛窦与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据1953年英文版译出)，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

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0年。

刘翠溶：《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动态》，收于《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1年。《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收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3年。《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载于《经济论文期刊》(台北)第14卷第2期，1987年。

千里与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

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1994 年第 2 期。
秦佩珩:《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84 年。
全汉升与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 32 本,1961 年。
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 年。《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 年。
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2 年。
北田英人:《宋元明清期中国江南三角洲の步と村手こにする研究》(《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江南三角洲农业的进步与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之研究》),スター商会(东京)印行,1988 年。
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层の形成との社会经济的役割》(《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绅士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职能》),汲古书院(东京),1992 年。
Elvin,Mark(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国过去的模式》),Standford Universiy Press(Stanford),1973。
Huang,Philip(黄宗智):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Standford Universiy Press(Stanford),1990。并参阅中文版(中华书局,北京,1992 年)。
Perkins,Dwight(柏金斯):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1368－1968 年间中国农业的发展》),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1968。
Skinner,William(施坚雅):"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19 世纪四川的人口:从零散资料中得到的教训》)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vol. 8,no. 1,1987。
Wang,Yeh－chien(王业键):"The Impact of thd Taiping Rebellion on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太平天国之乱对苏南人口的影响》),in Papers on China,vol. 19,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y (Cambidge),1965。
Wong,R. Bin & William Lavely(王国斌与威廉.拉夫里):"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Modern China:A Comparative Approach"(《近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比较研究》),Paper for presentation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New Orleans,USA,1991。